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在党内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指示。《人民日报》于6月21日在头版头条以报道北大反右消息形式，公开宣布“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对谭天荣等学生运动骨干，公开点名。这样，全国高校所谓“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号角，就由中共中央机关报吹响了。

三、敢言者“尽入彀中”

1957年10月13日的晚上，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前两天，我被通知到北大32斋309室（我住305室）接受谈话。汪作玲（班党支部书记）一人在。她严肃地向我宣布：“你已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你要老老实实交待你在北大鸣放以来的反党罪行……”在这之前，我已经有预感，反右斗争正在走向“深入”，一种被孤立、被冷漠的氛围笼罩着我，我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但确实想不到厄运来得如此之快。我犹如五雷轰顶。一个才22岁的青年，竟遭受如此沉重的政治打击！至今，我仍记不清楚她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名义宣布的。是北大校方，北大党委，还是什么司法机关？这在当代任何一个民主法治国家里都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个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在两个人的情况下，由其中一个学生向同班的另一个学生宣布：你已失去政治自由，你已是敌人，是专政对象，你要老实交待罪行接受群众批判斗争！这是谁给她的超越宪法的权力？太可怕了。可以想像，在统一部署下，全国55万余右派，包括北大715个右派（当时全校本科生、研究生共7342人）、汪的哥哥、于有海（班党支部书记之一、汪的丈夫）的父亲都会经

历过和我一样的聆听“宣布”的一幕。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种伤害别人，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又被人伤害的情况层出不穷，比比皆是。这就归结到一点，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没有宪政民主、没有法治，谁都不会安全，实际上也不可能安全。这之后不出1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失去了自由，国家宪法也救不了他的命。

半年后，在上海的妈妈收到了北大的信：

家长先生：兹有我校中文系二年级新闻专业学生江之泚在整风期间猖狂地向党进攻，堕落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其情节较严重，本人态度虽有转变，但仍不够，学校为了给他以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决定给予留校察看之处分，留校学习，进行考察。学校除负责对其加强教育外，希望家庭配合学校对该生进行教育。特此通知。

北京大学（印）

1958年4月6日

在1958年的反右“深入”、“补课”中，在“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口号声中，北大1957年秋季入学的一批学生也遭到厄运，被补划为右派。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宋后定”的学生，被“补课”给补上了，也成了“穷寇”。虽然此事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因为是“送（宋）来”“后定”，所以记牢了。

1957年至1958年，过去在盐城和我较说得来的年青同事和朋友吕庆仕、汤铎、唐景欧、龚平、王匡恒等都在各地、各个学习和工作单位先后被划为右派。其中，汤铎的处分尤重：开除、劳动教养。但我们之间，除我和吕庆仕相互有牵连外，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堕落”为右派的。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大概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思想都不见容于当道。1990年代初，我才初步了解到我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农业学校1952届病虫害防治科的43人，有5人后来被打成“右派”，1人被打成“坏分子”。

下面是南通农校1951届农垦科毕业生、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柏秋圃学长给我的一封信：

之浒弟：

接读来信，感慨万千。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多数经历过人生坎坷。没想到你的命运也如此多舛。有些南通农校的老校友你可能不认识，他们的可悲遭遇你可能也未必知道。例如1949年毕业后留在学校农场的王永怡，后在苏北行署公安处，不久去北京农机学院学习，毕业后夫妻双双坚决不留在上海（他父亲在沪工作），要求去甘肃干一番事业，结果在文革期间被整成反革命分子，判刑入狱5年，1978年才释放，1982年才平反，没过几年，因肝癌病故。享年还不足60岁。当年，他曾是国立南通高农左派学生领袖之一，属风云人物。其堂弟王永情，你可能认识，1950年在校参军，后在青岛海军学校，当过中尉，立过功。1957年，针对单位肃反过火，有逼供现象，他提了意见，被打成“极右”，又劳改4年，后在山东商河县落户，教中学。1980年以后才落实政策，评了个高级讲师，当了政协委员。前年，他和我取得联系，来我这里几次。年轻时英俊的影子，一点也找不到了，老弱得令我难以置信。现在是种菜、写字以娱晚年。

我的境遇尚算可以，不过在1957年和文革中，也曾有过轻生之念，一是想不通；二是让人绝望。结果是：在1958年说我同情右派（我当了4年班长），批判后给予团内警告处分。我所在班共16人，划了4个右派（其中一个极右，也是南通农校五一届的，叫韩明生）；一个开除团籍；一个内定特嫌，真是洪桐县里没好人了。……秋安

柏秋圃 1991.8.31

在北大整风鸣放中，大家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只要不抱偏见，都会发现，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确实不乏有真知灼见的治国平天下的方略，确实不缺富民强国的良策。没有一个大学生想要毁掉自己的国家，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民主、共和、自由、法

治、繁荣富强的国家。他们是祖国的儿子，他们深情地爱着祖国。他们得北大精神之真传，呼唤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呼唤人权、宪政、法治，何错之有？何罪之有？他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么可贵！然而，极权者就要一棍子打死！这一棍，带来了中华大地万马齐喑，带来了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带来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国家民族空前浩劫。数千万中华儿女在大饥饿、大动乱中无辜地死去！

四、进北大前已被打入“另册”

我被宣布为右派后，班上约开过三四次批斗大会。这当然不是辩论会、研讨会，是剥夺被批判者话语权的会，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会，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会。与两年前在江苏盐城专署机关的肃反斗争大会相类似，只是这次我成了“反角”。

当时，北大有不少右派，除受到大中小型批判会的斗争外，还“享受”了一人一份大字报专刊揭发批判的“待遇”。这种大字报专刊由十来篇文章、漫画和对联构成。内容极尽漫骂、丑化、讽刺、挖苦、人身攻击之能事。堪称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凡是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或家里人受过政治冲击的，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工农成分的是忘本的坏分子；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则加上“叛徒”的帽子。对其他右派的揭批是由分散的大字报承担。当然，对我的揭批也在其中。我这才知道，两年多前，我已是被他们左派默认了的“反角”，在档案袋里也早已写进了对我的政治“判决”。

我在“三角地”就看到揭批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

说，我的机关肃反结论是“政治不可靠，注意控制使用”。他们用这样一支政治毒箭，这样一支政治暗箭陷害人，这在以后的系列政治运动中对我都是致命的，这样的政治迫害可致人万劫不复。毒就毒在在不知不觉中“结果”了我、收拾了我。我在1955年肃反运动时才20岁，算得上是个求上进，德才兼备的青年，为什么有人以组织的名义在政治上暗算我？由于那张揭露我的“底细”的大字报，我才第一次知道，我曾工作过的中共盐城地委生产合作部给我的肃反结论是：“政治不可靠，注意控制使用”。那时，我并不是机关肃反对象。我这才知道，我早已被打入“另册”。这11个字，差一点定了我的终生。

我入大学前的4年，一年有9个月在洪泽湖畔、黄海海滩、里下河湖荡的蝗区防治东亚飞蝗，吃苦耐劳，认真工作，还认为是：“我确信：我将无愧于这伟大的时代”。这是结合我的工作写的高考作文《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中的最后一句。可谁知道，对我所做的结论是如此的残酷无情。无非是我有一个在台湾的爸爸。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才从回乡台胞那里和他带来的《中央日报》复印件（父亲逝世的讣闻）中得知，父亲在1963年因脑溢血逝世于台北，生前在国民党电信总局党部任职，他的治丧委员会主任是电信总局局长钱其琛（钱是江苏南通人）。有人告知，父亲“身后无长物”。记得我在检查时说：“我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父亲在大陆时曾任国民党南通县党部书记长），能上大学，还享受调干助学金，从内心讲，我是很感激党和人民的，我没有反党的故意”（大意），但有人批判说，“你有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你要挖阶级根源”，还有人说：“章伯钧、罗隆基当了部长，坐了小汽车还反党哩……”按这个逻辑，你能不反党？！我无话可说。在整个大学阶段，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受到“关照”的。我的日记被勒令交出审查。被批斗后，有一次吕庆仕来了封信，班上的党员干部张世晨非要我交出此信，我感到愤怒，你凭什么要我交出我的信？你一个共产党员怎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权力？我还是公民，我为什么没有受宪法保

障的通信自由？其实，信中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仅仅是互相通报近况而已。他越急着要，我越不给，他也越认为其中必有“大鱼”。我在逼得无奈之下，取来了信，并作“恭敬”状90度弯腰，双手捧着信给了他，边给信边说：“给你，检查官先生！”这一幕，想来，当事者会回忆起来的。另外一次是周恩来来北大做报告。我被告知到指定的课室楼的某个教室“自习”。去时，就有人尾随“陪同”。当然不是我一人，“同道者”均是这样的“待遇”。平时，我的行踪，也均在他们掌控之中。当了右派，也就被剥夺了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什么做人的尊严！有一次，我被逼急了，就冲着他们喊：“要杀就杀，要关就关，哥穆尔卡还坐了几牢呢！”（当时，哥穆尔卡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就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使不少“左视眼”总是用所谓“阶级分析法”去残害人。我从读中专时开始，就被认为是有海外关系的“另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是“政治不可靠”的，即使我万幸逃过“反右”，下面的什么政治运动还会再算我的“帐”。“在劫难逃”，这就是我政治上被推入深渊的必然。我是在无形中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包括没有了基本人权、没有了思想言论自由等。正是我们这样的国度、这般的制度孕育出如此的“怪胎”：档案中的记载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它胜过宪法和法律条文。难道我忧国忧民、追求民主自由，坚苦自立、忠实不欺是有罪的吗？

五、班上的两次批斗大会记录

在班上的“反右”批判斗争会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

家发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唯恐划不清敌我界限。有的人总觉得越“左”越革命。针对我的不应“唯成份论”，有的说：我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也去了台湾，说你（指我）如认为自己在第十八层（地狱），那我就在第十九层（江注：这种逻辑推理是不符合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精神的。越是国民党的高官及其家属，越是能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优待”而不是相反）。但我就没有受压抑的感觉，组织上信任我；有的说：我的父亲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我还在党委部门工作。我当时想，我不会怀疑你们说的事实。在实际生活中，在执行政策上，确实因人而异，但是，由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衍生出来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歧视，始终是主线，贯穿于当时整个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1957年10月中旬的一次批斗会记录：

贺永新：5月20日、6月6日给吕的两封信，制造等级论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有的提出选拔留学生不应是宗派主义地指定，自然指定的都是党团员，群众休想。”选拔留学生，当然要重视政治质量，党团员有一定先进性。难道要选出到国外胡闹的不成？事实上选出的也不都是党团员。“有的系不应采取组织保送的办法，保送的又都是党团员。”有些东语系的学生并不都是党团员。“有的提出党团群地位应一样看待。”你不是也进了新闻专业学习，和一些党团员一样拿25元调干助学金？“这个报纸（江注：指<参考消息>）是供高干看的，一般人没这个眼福。”反社会主义言论拿出去怎行，我们的报纸是供宣传反动言论的？“赵是团员出身好，保送上大学。”由于工作需要，服从分配，为何不可？“即使这样，我也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指机关肃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那样，肃反还有什么成绩？“清华大学自杀两个，情况不明。”以此挑起对党不满。“有人硬说我们不是有民主了吗？”“庸俗得发臭的人对《是时候了》加以攻击。”这是没落阶级的哀鸣。我们是主人，谁敢攻击社会

主义，我们就要和他斗争。“我这个人不会唯唯诺诺，谁要对我
不客气，我也对不起谁！”你这是什么硬骨头？“通过党的整
风，骑在人民头上的坏分子，应该得到应有的处分，滚出宝
座。”这赖也赖不掉，应放明白点。反对党的领导办不到。

闫焕东：对今天的社会有仇恨与攻击。他认为社会上有像他
一样的清高者，硬骨头，不会逢迎拍马；另外，就是有偏见的，
加入党团组织的人，上面说个是，下面也说个是，庸俗得发臭腥
气。他们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肃反时，为了表明自己立场正确
发言，现在又要向人家道歉，你知道自己是右派，想在肃反中滑
过去，下流！驳斥林希翎右派言论的为什么是不正当的？“一部
分人青云直上”，忠于社会主义的人，要给予充分信任，劳动人
民的子弟就是要看重，难道要信任你？在你父亲统治的社会，你
是大阔少爷。你自己思想反动，和党对立。从解放后到反右派斗
争前，党和人民政权对你怎么样？你在大学每月25元调干助学
金，在你父亲统治时期是否有这种待遇？谁奚落过你？在班上谁
奚落过你？刚来都一样。后来自己跑图书馆。为什么这么反动，
这么仇恨？从来没放弃从各方面进行攻击。认为别人歧视自己，
是因为你站在你反革命父亲一个立场上。

钱理群：民主自由问题。你诬蔑国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公
民权利没有保证。给吕庆仕的信中故意歪曲事实，借黄必达（江
注：中文系党总支委员）自杀一事说：“在我们国家里，事实真
相永远不会清楚”。引张元勋、沈泽宜的话：“我们贴出这首
诗，难保不进监狱”，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引呢？想这样封住党
的嘴。“五五年肃反缺乏理论根据，有些人被莫须有的罪行投入
监狱”，肃反搞清楚历史问题，为什么是“失去了人的尊严”？
借大字报上的“为鬼申冤”，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法制不完
备，这是‘三害’猖獗的原因”，说我们国家无法，我国有宪
法，有人民的法制，这些都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三害’分子
可以犯法，而不受到应有的处分”，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
青山不是党员？一直把对党的仇恨埋在自己的心里，到时候就按
捺不住自己。“现在不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行了”，企图揭竿而

起。实际上是说“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不扩大民主不行”。学生会人员产生是提几个人选几个、人民代表也是等额选举，“简直作孽”。候选人是协商出来的，一致通过也是经过充分讨论的，难道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广大人民兴高采烈的选举，他说是“作孽”。他一方面对我们仇恨，一方面又像笑面虎。他说，在我们社会没有民主，他要争取的是反革命的民主。整个信中打了民主、自由的旗帜，企图推翻党的领导。自己写的还赖得了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应放老实些！

朱劲干：他的这两封信证明：他与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势不两立，思想深处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反对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有人贴出要求取消高校党委制的大字报，他全部同意。对中国人民大学也诬蔑，说“人大是教条主义根据地，教条主义贩子”。说“我们这里有许多入党团的人不用脑子，像日本人敬重天皇一样，只喜欢念经，不会用脑子，庸俗得发臭”，说“滚出他们的宝座”，他是反党能手，非常明显。“人民有说话的权利”，不让谁说话？什么“国家闭关自守”？把我们的国家竟比作封建王朝！他认为支持和反对林希翎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所谓“一见到反对意见就条件反射”，为什么对林希翎有了完全不同的条件反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条件反射。“敢于进忠言的人，更容易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往往会遭到人们的非难”，他的一篇稿子贴在墙报上，我受到迷惑。我和他家庭情况差不多。我的入党问题不能解决，家庭成分不好，这是先天不足，当时我同意他的看法。现在我不这样看。他这个右派分子不是这次才产生的。我是个非党员，在党委机关工作，难道不平等吗？“‘广场’空气新鲜，畅所欲言，没有黑暗”，他认为开座谈会是对老头儿的办法，不是对年轻人的办法。

杨耀秦：对人民犯下了罪行，是如何考虑的？不要装傻，观察问题应该机智些。“5·19”后兴高采烈，后一阶段沉默了，你是怎么想的？妄想过关过不去！

张健：反动性之顽固，从郑（宗钊）可以看出，从江也可以看出。你为何仇恨社会主义、共产党？你想办法避开这个核心！

很清楚地看出，这是用全称咒骂所有的同志。说现在的青年“是没有棱角、棱角被磨平的、不会思考的”一群。一方面把领导说成是天皇，很欣赏等级制，把自己说成是落后的末一等级。江也是北大学生，并没有满足，希望执政。按照他们的政治观点执政。匈牙利事件时幸灾乐祸，发现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被推翻的。听林希翎报告坐在前一排。江要向肃反对象道歉，说明你非常爱胡风和你的反革命父亲。江恶毒地攻击新社会，与郑及其他人一样，对自杀问题感到兴趣。恋爱自杀了，与社会有何关系？把自己称为硬骨头，话里要以牙还牙。为了表示立场而错斗了人，诬蔑广大的自觉捍卫社会主义的人。“吓了一跳吃一惊”，吃什么惊？显然，想滑过去。开学后装着没有事，实际上写诗是不高明的。自己人格表示是两面派的。最近表面上看起来沉痛，另一方面和同屋的右派郑宗钊有勾结。郑看江的日记。两个人狼狈为奸。江表面上文雅，劝你老老实实交待反动思想。

刘仪：江面目可憎，进一步暴露态度极不老实，想滑过去，想抗拒。态度不老实，倒霉的是自己。反动思想的挖掘与事实的交代有出入。

杨立标：还在顽抗，学郑，提什么，说什么。说我们社会有等级制度，认为进忠言要受打击，拍马屁的人青云直上。能坚持党性原则的如张世晨，他很恨。他爱憎分明，我们爱的是他所恨的。攻击要求入党的刘仪和黄望南。他要求说真心话的实质是要反党。你说在这个社会里怎么受到歧视，你不是也进了新闻专业？你仇恨我们党，发谬论很自然。这是阶级仇恨。你攻击学生会、江隆基书记。

张世晨：从一贯言行、大字报、信、墙报看，他立场鲜明、爱憎分明。1) 恶毒诬蔑社会上有人逢迎拍马，是卑鄙的小人，他也拍马，他拍林希翎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马。拍在中国已被清算的、快要被清算的马。储安平的话、林希翎的话、章罗联盟的话，你都相信。“俯首甘为孺子牛”，让人民骑马，我们做得更对。完全正确。相反，给右派拍马，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可耻的、卑鄙的。你为胡风、刘奇弟拍马，为没落阶级拍马才

是可耻的。2)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发表北大消息? ”, 你标榜要做一个无偏见的人民新闻工作者。你欣赏《文汇报》, 你所谓的新闻自由, 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在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新闻自由。你不高兴, 我们还要坚持这一点。3) 你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 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代表你所谓的人民, 你恶毒歪曲是无用的, 你骂了党报, 正说明党报做对了。4) 骂我们服从组织、响应党的号召, 钻研马列主义是像日本人对天皇, 小和尚念经、不动脑筋, 用意在于挑拨党群关系。你自己才不动脑筋, 对林希翎欣赏, 对林的观点无保留地完全拥护。对肃反, 说没有理论根据才算不动脑筋盲从。5) 说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好, 喜欢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我们的选举是慎重的, 资本主义国家哪有工人的选举自由? 对《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 》社论, 为什么仇视? 说自己思想糊涂, 为什么对反击右派的大字报那样仇恨呢? 我们的大字报贴在你们的大字报上, 为什么你这样反感? 他的检查想把自己的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说成是思想问题。赖也赖不掉。

谈建华: 对新闻制度极度仇恨。他所谓的新闻自由, 不外乎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捧《文汇报》, 赞扬对北大民主墙的报道。《人民日报》是最体现出新闻自由的报纸。她报道社会建设成就、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这是本质的东西。是为人民喜欢的报道。他说要献身于人民的新闻事业, 他要为人民鸣不平, 但看他的两封信, 他会干什么? 不要耍小聪明, 顽固不化, 即使被开除, 在劳教中还是要斗争。

他狡猾地隐晦自己反党反人民的思想, 他的两封信多么恶毒! 说没有动机是骗人。批判郑宗钊时他考虑策略如何对付我们。你一天不交待, 一天不认罪, 一天不放过。

陆嘉声: 他骂党团员, 把自己描绘得可怜。他是否是父亲逃到台湾去就被歧视? 我们有同学父亲被枪毙了, 他为什么能入党? 党哪一点对你歧视, 人民给你助学金。根本原因是, 他认为在我们社会里, 他没有打倒党的自由, 不能像过去那样作威作福了。我们的社会是人民民主专政, 你感到不自由。“我已决定献

身人民新闻事业，为人民利益而斗争，人民应有说话的权利”，他认为我们社会一片黑暗，要他这个骑士来鸣不平。他认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理解的“人民”就是反革命和右派！“要有更多非党报纸出现，代表人民说话”，他想利用报纸向党进攻！他的思想反动，根深蒂固。他会耍花招，表面上不顶，平时规规矩矩，会上装傻，好像人家在逼他。他是老狐狸，但我们还希望挽救他。

张海晏：斗争中揭开了盖子。回想过去，他一向是两面派，装积极。刚一来好像较老实，和蔼可亲，也没放弃他的进步要求。表现得隐蔽，时刻不放过跃跃欲试的机会，他会看风使舵。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同学中有人认识不清楚，他表现活跃，提出带问号的话，狡猾！对政治社会问题不谈，警惕性很高。在看风使舵上，比一般右派高明些，他知道在哪种情况下就顺过来。所以，有的同志认为江可以回头，这证明他更狡猾、阴险。他对会上提示到的就应付一下，不提示的就不说。

王兆麟：他在两封信中，把北大毒草全部完整地介绍出去，集毒草之大成，起了毒草运输队作用。如吕庆仕给别人看了，影响更大、更厉害，放火作用更大，更恶毒。事实胜于雄辩，铁证如山，赖不掉。林希翎谈的有关胡风的一段谎言，他在信中介绍了，不明真相的人会把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看做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他自己亲耳听到人大讲师是怎样批驳林的，他不插话，只节录这一段。他反对开座谈会，说这是对付老头、老太的办法。说法制不完备是“三害”猖獗的原因。说整风不是恩赐，匈牙利人民的血不会白流，这就看出，他理所当然的是要推翻现行制度，这是必然结论。

石家宜：对党团员咒骂，大家不能容忍。他保存和发展了他的没落阶级仇恨。我是个群众，他说是党天下，这是各个右派分子都说的。有良心的人，凭着良心说话的人说的话，右派当然认为是拍马奉承。我没有进组织，有缺点，不上进，就不如党团员，要向他们学习，更需要改造。

1957年11月3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6-2班批判右派江之浒大会发言摘要

钱理群：关于等级制度和新闻自由。我父亲也是国民党高级官员，逃去台湾。如果说江处于第十八层（地狱），那我就处于第十九层。但从上海一解放开始到现在，我没有感到受到歧视。我加入少先队，担任少先队职务，高一时我不是团员，组织上分配我做辅导员。在我们社会中，党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并不歧视。党应该不应该加强对工农子弟的培养？他对培养工农干部不满。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不注意培养工农子弟，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这一点，正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无可讳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一般是不与党同心同德的，必须要得到改造。他为什么成为右派，怎么不从阶级出身找根源呢？到底是受到歧视，还是他自己不改变立场？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做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3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

有在现在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

王兆麟：他对《文汇报》、《新民晚报》大加赞扬。我们看这种报纸很难过，他看起来幸灾乐祸。

常存：关于苏军在东北问题。苏军出兵东北干什么？这是个基本事实。苏联按国际协定，为了解放东北人民，他看这问题，不顾这个事实。东北人在日本统治下14年。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作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统治残酷。是苏军解放了东北人民。在战争状态下，“8.15”以后，社会秩序乱，主要是抢劫。苏军进驻东北，个别人违犯纪律是有的，是看基本面，还是看一小点？正如出现一个江某，就说三班是全黑了。当时，国民党就宣传沈阳、四平苏军如何如何。事实并不如国民党和右派宣扬的那样。据说第一批部队中个别人是从西伯利亚劳改营来的。苏军维护中国人利益。地方上的事，中国人自己管，市场正常。个别人纪律不好，苏军司令部严肃处理了。龙云等人也大肆渲染苏军在东北撤机器、撤工厂的事，也是以反苏反共为目的的。工人阶级国际团结不利于敌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团结对他们不利，反动派不惜造谣和诬蔑，这件事本身是带有煽动性的。主要是有他们的政治企图。

陈帼雄：他这样反动，一贯对党仇恨，组织上不重用是对的。自己还要对肃反对象道歉，能重用你？他说他的骨头硬，不会唯唯诺诺、拍马奉承。他说这社会把青年人的棱角磨平了，使他们成为庸俗低级的人。他认为服从组织是唯唯诺诺，党团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有意见可以提，但没有得到组织同意前，应服从组织决议。拍马奉承与党的性质不相容，只有资产阶级政党才需要拍马奉承的人。

黄望南：他说肃反是搬了苏联的经验，因此扩大化了。我国肃反是否必要？是否扩大化？鸣放中，有人为反革命分子伸冤，“5.19”以后，郑每天叫喊冤枉了，斗错了。郑说：“你过去斗别人不知道痛苦”，这说明他对党有刻骨仇恨。江在肃反中没被斗，并且斗了别人，为什么对肃反这么仇恨，这说明他一贯对党

仇恨。在鸣放中提出肃反来非常恶毒。他以为可以拉拢群众，达到他的目的，但他的论据不足。他从思想上、生活上、各种重大事件上，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他总要把事情颠倒过来。

何林中：那时反革命分子猖狂，杀人抢劫，社会秩序很坏，人民不能安身，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肃反是必要的。肃反有缺点，主要是，还有反革命未肃清。出身不好，先天不足，后天也可以加强。不是人们硬要把他和落后拉在一起，而是自己坚持反动立场。

刘仪：他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思想问题。今天划他为右派是正确的，否则，也就挖不出来。阶级未消灭，他是右派，这是客观存在。过去如果说歧视他，完全对。对于仇视党的人，就该歧视他。过去对他宽了，应纠偏，再这样下去，就要专政。我说真心话，我体会到的是党的光荣和伟大。1948年底，解放青岛，我走了一个村庄，敌人在另一个村庄杀了135个人，我们逮捕了这个凶手。我家是地主，在我家就有一个寡妇当长工。1937年来北京，没有党，这种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应该被斗，1948年从北京到青岛再到解放区，党应该怀疑。我觉得党对得起我，派了9个干部调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领导做了肯定的回答，党委书记亲自找我谈话。在过去能否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忠诚与否，靠自己的表现。他夸大了肃反中一些缺点，抹杀成绩。对苏联问题上也是这样，以此来否定现在的社会。他说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的事为什么不登报，而国民党时的沈崇事件就登报？说他是老右派，不冤枉。

张世晨：他给别人的信里，说他后悔考大学，他以为考大学，才使他成为右派。他心情颓废，说前途没有了。当然，反党的前途是没有了。他说我国没有法制，他喜欢过去的法制。他诬蔑苏军，苏联对犯罪的是枪毙的，美军暴行是怎么处理的？问题是要看国家对事情采取什么态度，这有什么损害中华民族尊严？蒋介石卖国才有损国家尊严！苏联是国际主义的，并不如你所说的。党报代表人民利益，非党报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能代表人民。《文汇报》几次犯错误都是因为离开了党的领导。资产阶级

允许工人阶级报纸存在，这是他们的政治需要，是幌子。资产阶级离开工人阶级，是不能存在的。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办报纸！为什么要这么歪曲、诬蔑，这是因为他一贯仇恨人民。

杨立标：他的态度极不老实。弄一点同学们都知道的、表面的、无关痛痒的交待一下。第二次批判会上，在追问下，有些惊慌失措，装出无赖相。第三次更猖狂否定一切，大量事实提出后，还想滑过去。社会主义是万夫当关，你是过不去的。他是反党老手。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小小年纪就有特权思想。匈牙利事件后，得意忘形，喜笑颜开，散布反动谬论。只有你自己“像日本人敬重天皇一样”敬重那些右派，谁要说林（希翎）不好，你就要吃人。在人民面前，你把仇恨埋在心里。在给吕（庆仕）的信中，你骂党，不惜歪曲事实，阴险地攻击党。把北大最反动的（大字报）贩卖出去。他也用诗写反右大字报，自以为聪明绝顶。他一贯反苏，苏联是我们的朋友，正是他的敌人。他歪曲我的话，进行反苏宣传不能容忍。我没有原则乱说，是自由主义，认敌为友，多么麻木，没有警惕性，自己有错误应检讨。他则利用我的话来反苏，企图拉我做挡箭牌。

王汉武：这几天批判江枫，他说江枫还是反右健将呢！说“凡是批判别人的人，不等于不受批判。”以自己的心度别人。言语恶毒、巧妙。

朱劲干：我过去在农村工作，农民问我是什么出身，我说是地主。1950年参加土改，父亲被捕，思想苦闷过一个时候，周围的同志，包括农民和农村干部对我教育、安慰，解决我感情上的问题。农民也不会看不起我，主动接近农民，执行党的政策，党没有把我当外人看。一度闹过情绪，县委书记也跟我谈了话。土改、合作化、统购统销，不依靠贫下中农，贯彻阶级路线行不行？他搞农业技术，其实中农最保守，肯接受先进生产技术的是贫雇农。在干部的使用上也要贯彻阶级路线。为什么右派中地富家庭出身的多呢？所以，对知识分子是要考验的。他企图攻击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这是诬蔑，是徒劳的。

以上的两次批斗我的会议记录，是我从故纸堆里偶然翻检出来的。回想当时批判我的情景，让我坐着记录，没有像文化大革命时那种动手动脚的情况，骂骂“下流”、“阴险”之类的话，也无伤大雅，因为对我的“反党罪行”感到深恶痛绝嘛。从发言的内容看，有的同学还是费了心思，看了些书，找了一些资料的，也就是说动了点脑子的，希望在运动中有较好的表现，不致也被戴上右派帽子。有的是借此表一表态，老不发言怕不好嘛！当然，有的发言确实想在政治上获取某种功利的。我当时心里就明白，我被打成右派，与你们怎样发言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想这历史的记录，主要是可以让后人看看半个世纪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的最高学府，人们是怎样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党领导下，拿着怎样的批判武器把“右派”批倒、批臭的。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看来，对于“批判武器”的批判，还任重道远！

六、同窗相煎何太急

1958年4月，我受到了学校留校察看的处分。在一次会上，我曾向系领导提出转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请求，遭到驳回。理由是：“你们年轻人，改造好了还是可以做新闻工作的，难道你们还不如留用的旧社会老报人吗？”此话，我当时并不相信。数十年后，我的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我还真的在江苏做了十多年的新闻工作。这说明，即使在那种情况下，还有头脑较冷静的人。

我的反右后3年大学生活，在严厉的群众监督改造下，无希望地艰难度过。我曾数度想离开这个折磨人的世界，但一想到老母，一想到我好不容易考入北大，如果就这么“走”了，太不值

得，且要落下个自绝于人民的骂名。

反右后，我们班曾在十三陵水库劳动、在京郊北安河办乡报，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后，我们从海淀秀丽的燕园来到城内铁狮子胡同1号（张自忠路3号），1912年，袁世凯将中华民国总统府和国务院设在这里。1919年以后，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将这里设为总理府。1924年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又成为执政府。“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执政府的大门口。每到夜幕降临，在校门口，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总是感觉阴森森的。联系到当时自己的处境，一种凄凉、恐惧之情不期而生。

到人大不久，我们就去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做铸字、排字的活，十多天后又去周口店区河北乡花果山挖鱼鳞坑，之后密云炼钢、参加北京市朝阳人民公社王四营社教运动、到沈家坟羊坊水库工地干活，我都随班去了。在班上，我和左派的关系已被后者剔除了同学关系，是完全的敌我关系、十足的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改造和教育人者与被改造被教育者的关系。那种冷酷的精神桎梏，心理脆弱的人注定要从忧郁走向精神分裂，至少是要减寿的。后来，班上同学去办《机械工业周报》、厂报时，我和其他班右派留在系里。我和林昭、伍伯涵、傅家训、房文斋、甘粹、雷凡、伍士杰、朱绍武等一批人搞资料工作，其他人在系印刷厂劳动。我们主要任务是从北洋军阀、民国期间，建国初期的国内各种有影响的大报中摘抄与新闻活动有关材料，做成卡片，为别人撰写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做些基础工作。

一天晚上，我在寝室里信口哼唱《沙漠像黄的海浪》（很少有人熟悉这首歌），令我十分惊奇的是伍伯涵兄（他是安徽人）也跟我一块哼将起来：

沙漠像黄的海浪，
流到无边的远方，
蒙古包似起伏的海岛，
骆驼在那里徜徉，

月光下，有人燃起野火，
悠扬悲壮歌唱，
我们要生活，
便要战斗，
沙原是自由幸福家乡。

这悲壮、豪放的歌曲，让我们又重回到十多年前抗日战争的不寻常岁月。我正是在七八岁时学会唱这首歌的。想起如今的处境，“自由幸福”又在哪里？

1958年12月23日，林昭告诉我，叶兢耕老师(在北大时给我们讲授《文艺学引论》，讲师)早就自杀了。后来，我们又转入剪报公司（即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前身）。林昭仍留在系资料室。

在剪报公司，从本系、中科院等单位抽调来的干部和部分右派兄弟做编辑工作，我和伍士杰专司递送已编辑加工过的剪报，属于纯粹的体力活。我俩有分工，把北京分成南北两大片。伍送北片，我送南片。我的那片有四五十个订户，记得主要有文化部及其下属的一些部门、单位，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及它们的下属部门和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社等。那时，正是冬季，待剪报公司下午下班，天色已快黑了。我和伍各骑一辆公司的28英寸的永久牌自行车开始送剪报了。送完剪报，到饭馆吃一顿饭(公司每次补助0.3元)，回到学校宿舍，大约都在22点左右。洗洗弄弄，23点才就寝。天气冷些，倒不要紧，但雨雪、大风天气，就不好受。有的单位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点像个迷宫，不能走正门，要经过地下室，弯弯绕绕到警卫部队营房，再绕来转去，才找到接收剪报的地方。幸亏类似这样的单位不多，否则，22点也回不去。

有一次，公司领导人宋来未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一份材料送到外交部新闻司。我去了东单外交部街(石大人胡同)30号，材料送达后正准备离开，被他们那儿的一个头头叫住，他们几个以为我是剪报公司什么官儿，把我教训来教训去。我又不好说我

只是个送资料的右派学生，公司事与我无关，只好边挨教训，边作诚恳认错状，直到他们歇怒了，才得走开。我算是在堂堂外交部代人受过、“顶缸”了。原来，要我递去的是公司领导的一份检讨书。事情原委是，中宣部下拨4万元人民币，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筹办一个剪报公司。系里办这件事还是大姑娘上轿第一遭，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说苏联可能有剪报公司，是否可以写信向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就此事咨询一下。这样一来，苏联方面知道中国可能已办了剪报公司，就要订购剪报资料（那时刚刚创办，按订户要求，把当日有关报纸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等内容剪下编辑好贴到另外的白纸上，装订后送给订户。十分原始的生产方式）。而我们的外交部矢口否认中国办了剪报公司，更不要说接受订购剪报了。查来查去查到了人大剪报公司，公司只好挨板子了。

我们这些右派兄弟被安排集中住宿、集中劳动、集中管理，比起在班上动辄遭到批斗、责骂，时刻处在“贱民”的阴影之中的日子来，要好受些。劳动之余，我们通过刘少奇前妻、人大副校长聂真之妻王前，借阅学校图书馆的一些俄罗斯和西欧文学名著，还有其他报刊。这些东西，在班上绝对是绝对不允许看的，据说是“有毒”的，看这些就是抗拒改造。有一个星期天下午，阴冷的天，二姐穿着军服（当时女性军人佩带大尉军衔在京城大街上走，是不多见的）给我送来一条棉被，我正在宿舍里读《悲惨世界》。有个右派兄弟说，真想不到，有这样的姐姐，你还当上了右派！我说，你进大学前，不是上海市的人民警察吗？我们之中除我和林昭、陈建勋（分去内蒙古，又到安徽铜陵，返沪当教师，退休）等几个人来自北大以外，都是人大的。我们都是清一色的调干。大家和睦相处，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但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左右，我们又被“分割”了。

班上同学回校，右派兄弟们又回到各自的班上。回班不久，我就受到全班大会批判，认为我不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有严重的抵触抗拒情绪。起因是，在一本讲义上，我曾摘录了《离骚》上

的两句：“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我自己都忘了什么时候写的，有人看到了，终于嗅出了我的“顽固的反动立场”，我这可惹下了天大的祸。会上“火力”之猛，超乎寻常，我被批斗得一无是处。

有几件事，很难忘却。

1958年七八月间，在京郊北安河，同学们办乡报，我的任务是在刻印乡报之外，和农民一块劳动。那里的稻田里有不少泉眼，稻田用泉水自流灌溉。在烈日下，和农民一块薅稗子（用手拔掉稻田里的一种杂草）。在一次思想汇报会上，我谈到了田里蚂蟥太多，被吸了不少血。就有人认为我劳动表现不好，论据是：“蚂蟥不叮勤快人”。

1959年5月，在京郊密云县炼钢，我们住在“干打垒”又叫“地窝子”里，即“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那类。离住地不远处有小高炉群，北京许多高校也去人的。我们的主要劳动是向小高炉不时送料“填肚子”。料有三种，即铁矿石、石灰石、焦炭。每次送料，每样都要数十斤，过筛并按比例称量，在一定时限内，通过辘轳往高炉上送。给我的任务是：和值班同学一块过筛、称料，然后再由我这个专职“辘轳手”往上绞。待这一批次三样料送进高炉，就马不停蹄地准备下次的料，再由我绞辘轳。别人干得很轻松，而我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这且不说，同学们是三班倒，我则被安排连续上两个班才去睡觉休息。就是说，我一天要干两个班。这种超体力劳动安排，不知是校党委还是系党总支还是某些人的决定？是要改造我的思想，还是要惩罚我，折磨我？曾有三四天，我每天便血一两次。往往是有便意，“大便”下来的却是一大滩鲜血，没有一点粪便。后来，我告知分工“管”我的党员同学孙新德（毕业后分到光明日报社，后来病逝），让他去看了我便下的鲜血。但我的处境并未得到丝毫改变。我只好咬紧牙关挨过了这终生难忘的一个月。

还有一年的光景就要毕业了。慢性鼻炎让我痛苦不堪，晚上迟迟不能入睡，睡眠质量很低。呼吸不畅，有时成天昏昏沉沉。

加上被专政的身份，真是雪上加霜。1959年秋季，我到学校定点的医院北京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治。确诊为鼻中膈弯曲，必须手术根治。考虑到毕业后肯定发配边疆，哪有条件和机会让你做手术！我决定用“遵医嘱”去向“管”我的党员同学请假治病。经他向党支部请示后，方才同意让我住院。手术顺利，把鼻中膈弯曲部分“裁直”，医生让我看了“裁”下的像鱼鳞样的“边角料”。手术后一周，我就出院了。这个病得到及时治疗，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我十分感谢为我主刀的那位医生和细心护理我的那位爱跳舞的护士。

1960年前后，在京郊沈家坟水利工地，那时，冰天雪地，工地上的冻土层就有半米左右厚。有时“硬攻”不下，只好“火攻”，以柔克刚，烧烤冻土，费了不少柴火，才掀掉冻土块，以便在下面取土。我真想不通，大雪纷飞、北风呼号、滴水成冰的数九天，有什么必要来做这些工效极低、成本极高，让人活受罪的事？工地上一大奇观是：大雪天，人们都在啃买来的冻柿子。班上同学负责宣传鼓动，成了说相声、打快板的一族。我被安排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小冷炕睡了4个人，大家头靠脚，脚靠头。与我做“邻居”的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有点气喘。有人说他在旧社会当过铁路上的小警官。他满腹牢骚，指桑骂槐，骂着骂着，矛头指向了我（我知道自己“身份”，从不和人多话的），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务，是专门来监视他们民工的。我白天和民工一块劳动，晚上还保持警惕，睡不着。我害怕他对我这个“共产党派来的特务”下手。我这个反党的“右派”，竟又兼了共产党的“特务”，连我自己也找不到北了。这种无端的精神折磨真要人命。

1960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我又随班上同学去了北京东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办公社报（我的差事是递送公社报和参加农业劳动）。因为住宿、吃饭都在公社机关，每天都经过公社党委办公室，总看见一位个子较魁梧的中年人，他就是项南。他原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据说一年多前，“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

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此时，被贬到这个公社任党委书记。他是在毛的“反右倾”中成了倒霉蛋的。从我内心讲，真有点“惺惺相惜”。这段经历也锻造了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一职后，为改革开放、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先驱”。

多次下乡劳动，那些左派对我的评价不是表现不好，就是“没有使出全部力量”。至于说我不暴露思想，不联系思想实际，这是我无法满足他们的。因为我只长一个脑袋。我只能违心地在思想汇报里说三面红旗万万岁。彭德怀、张闻天都打倒了，你一个小小的右派胆敢乱说乱动！这不，1960年初，张万来（同班同学）从山东老家带来几个糠菜窝窝头，让同学们品尝，后来遭到严厉批判。他可不是右派！其实，对什么“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教育革命”、“拔白旗”、“向党交心”和内部刊印资料，批判茅盾、巴人等，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心中有杆秤的。

当了右派，在考试计分上也被打入“另册”处理。“教育革命”一波又一波，在外面“放羊”久了，大三大四的一段时间又响应号召，回校“认真读书”了。有一些必修课也要考试了。记得那次考《哲学》（口试），全班有两人不及格。我那次答题无懈可击，我原以为，得“优”难说，得“良”则十拿九稳的。结果却是“及格”。这位老师惜分如命是有缘由的。这就不饶舌了。我已满足了，谢天谢地，只要过关，怎么都行。

七、右派兄弟姐妹相濡以沫

后来，即使又被“分割”到各自的班级，我们几个右派兄弟

仍利用星期天到外面聚餐的机会，交流各人的情况，放松一下被压抑的心情，感受点人间温暖。经常去的是西单商场内的一家四川饭馆。伍士杰（后改名伍柳）是四川人，他是“联络员”，负责订餐。他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足可以和饭馆的师傅拉上老乡关系，我们也就能吃到相对价廉物美的饭菜。

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在前门“便宜坊”吃饭（菜主要是鸭杂碎之类），弟兄们都享受每月25元的调干助学金待遇。据了解，在京城算沾了点光，全国其他各地的右派调干大学生在反右后都取消了这一待遇。我们实行统一付款、平均分摊的AA制。那天，一眨眼功夫，每人都有四五碗大米饭下肚，桌子旁堆上高高的两摞碗。在旁边吃饭的两位军人瞪大眼睛看稀罕，定睛看到我们的校徽，才会意地笑了起来。从1959年起，我们就感受到饥饿的威胁，从在全国其他地方学长的来信中，知道大家彼此彼此。

我们还相约去陶然亭公园度过星期天，因为那里较冷僻，不太会碰到各自班上的同学。有几次都是在那里度过一整天的，甚至在湖边木椅上睡一觉。

1959年暑假，我和傅家训、伍士杰等结伴南行。在无锡，家训理所当然地成了“导游”。他考进大学前在无锡的银行部门工作，他爱人张明珠的家也在无锡。我们玩了梅园、蠡园，去了鼋头渚。太湖风光尽管很美，也丝毫撩不起我们的兴趣。大家想得更多的是一年后会充军到哪里？这情势怎一个愁字了得？我们甚至羡慕起鼋头渚的和尚来了，大家得出的结论是，由不得你。就是遁入空门，当个和尚，也是求之不得的。

回上海后，我曾给在京的林昭一信，谈到大家游无锡的心境，并告诉她，托我带给她母亲的东西已送到她家。时过境迁，至今回忆起来，仍不胜唏嘘！下面是她的回信。

小江：

来信何其客气，使我大不敢当。夫虽多吃了两年稀饭，又何

敢自居大姊也。一笑！

无锡是我旧游之地，鼋头渚上浩歌当风，非止一次，要说风景比杭州好，有有道理处，也有不尽然处。杭州的苏堤春柳，六桥烟雨，自有其妩媚处。而古迹遍地，苏小墓、秋瑾墓，以至武松墓都有，管他真假，也总大可发思古之幽情。鼋头渚好的是个太湖，虽非岳阳洞庭，气势也就不弱，山色波光，自然之美，而且气魄也大。既留恋至于不想走，后日毕业分配，填志愿时，大可加一项道：“无锡鼋头渚饭店招待员”，以为如何？

所说的煮饭烧菜各节，恐怕并不翔实，而以“报喜不报忧”的成分居多。推测起来，饭“没煮糊”，可能是夹生的；菜“多放了些油，特别好吃”，则可能是做油的晦气不着，变成油拌茼蒿菜了。至于瓶罐乱响，匙碗杂置，生火而手脚慌忙，炒菜而铲刀倒持，犹其余事，不消说得。

回来是我也很想，不过现在尚未敢必。本来，行政人员有7天假期轮休。资料室如老董等已经开始“休”了，杨公（江注：指杨纤如老师，也是右派）与我则未排，似乎不加理会的样子。据了解，并非“帽儿”之故，而是因为我们如今手里弄的工作要紧。杨公叹道：有他与没他毫无出入的人倒得休假，是好在做事的人反不得休，“真他妈的！”不过，我准备再三请求一番，竭力争取回来一次。时间约在中旬以后。台风过去了没有？

最近北京下雨下得发昏。六日大雨，从下午直落到晚上，一刻不止，来势又猛恶，好像天公打翻了个大脚桶似的（比喻殊不高雅）。因了这场无妄之灾，甘粹（江注：林昭的未婚夫、人大新闻系1959届毕业生、右派）等明天就要开赴西郊劳动（排涝）去了。谢谢你跑了一趟！ 假日好！

林 1959.8.9

从上面这封信看，1959年下半年，她还是那样达观。信的字里行间充满诙谐的情调。谁也料不到，不久的她，噩运连连。1964年2月，林昭在狱中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充满浩然正气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1968年

4月29日她在上海惨遭杀害。2004年4月22日，在苏州灵岩山南麓的安息公墓，她的同学、亲朋举行了林的骨灰安葬仪式。她终于在太湖之滨安息了。但是，我们确信，她在太湖之畔、灵岩山之巔，会永远“浩歌当风”，去“唤醒中华”的。

1959年9月的一天，有人告诉我，林昭请我到她房间去一趟。她也住在9楼（二楼），就在我们宿舍（13室）的隔壁。当我到她房间时，已有几个右派兄弟在了（甘粹不在）。林一边告诉我们：“甘粹分配去新疆。大家看看，怎么办？”一边去看墙上的全国地图。大家沉默良久，我谈了点看法。我说，不去新疆，又去哪里？如不去，且不说没有生活费，又是右派，单说户口、粮食关系，布票等票证全没有，怎么活下去？这是个全面受到控制的社会。依我看，还得先去，再相机行事。这个看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甘粹后来去了新疆尉犁，在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的塔河中学教俄语。一年后，弟兄们都走了这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当时，对大学生右派的处理，有4种：1）开除学籍，劳动教养。2）保留学籍，劳动察看。3）留校察看。4）免于处分（仍戴帽）。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6级共九十多人，共划右派8人、“坏分子”1人。其中，我们这个小班共划了两个右派，我是第三种处分；郑宗钊是第二种处分。1959年，我和他终于联系上了，下面是他给我的复信。谈到他和北大中文系的其他右派教职工、学生劳动察看的情况。

之洪：

接来信，颇欣喜。我也早有写信之意，但考虑怕有不便之处，就一直耽搁下来了。提起笔来千头万绪，有一言难尽之感。

去年3月28日晨7时许离校，8时10分乘火车，10时7分抵燕翅，改乘汽车，至3时许抵达目的地，我们的劳改大学：西斋堂，车子所经之地都是山、山、山，山谷中有湍急的清水流过，望去十分荒凉。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的先生将我们接到新居。一

个老乡的房子。房子是用石砌成的，室内在午后3时许就恍如到了黄昏一样，由堂而皇之的北京大学的明亮课堂、美丽校园、三十二斋清静的宿舍，乍一来到这里，颇有洞中方一时，世上几千年底隔世之感。在屋中小坐之后，即背起背篓上山去，每人背下一篓黄土，用以和煤作烧饭之用。我曾在西山（距北安河一里地的环谷园，现第四十七中学所在地）上山锻炼有素，一马当先地将土背回。也好，劳动确有促人新陈代谢旺盛之功。5时许开饭—玉米丝糕、窝头、熬玉米面粥，白菜熬萝卜，我们狼吞虎咽地塞满了肚皮。我和刘嘉屏及三下放干部同屋，10时入睡。翌日晨6时起床，上山修水渠，开始了新的生活。老乡们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清早上地（上山），傍晚回家。主食是玉米、小米，夏季有菜蔬（土豆、菠菜、小白菜、黄瓜、韭菜、辣椒等），冬季基本上吃腌菜。这里属门头沟区，在京西，是老区，经历过残酷的抗日战争，农民的住房多被日寇焚烧，那时，农民以吃树叶、糠、野菜等为生，如能睡3天安稳觉，那就是莫大的幸福。故有“少活10年”之说。近年来，我们几乎参加了从春种到秋收、冬藏的全部农活。打过核桃、拣过杏、盖过房子，也当过牛倌。总之，是无所不干。

……我们一日三餐，早晚玉米渣粥，中午窝头或小米饭。今年较去年伙食有改进。一月能吃几次馒头和几次大米，菜也够吃的。我们平时在农民食堂买饭，有白面就自己烧饭吃，我们村有下放人十九、同道者二十，大家推出名手做饭，故尚能吃到美味的水饺、捞面、压饅饅以及可口的菜。每月发12元5角生活费，虽不富裕，但也够用了（家中当然要补助衣、鞋等的）。

宗钊 1959.9.24